

第四章 南流江航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合浦港的兴起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岭南设置了合浦郡，其领地相当于今广西的防城港、钦州、灵山、横县、浦北、北海、博白、北流、容县、玉林和广东的廉江等县市。《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白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泽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两汉的统治者为海外诸国的珍奇异物所吸引，使臣携带黄金与杂繒出海进行商贸交易，这是中国丝绸通过海路流入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最早记录。由于汉代航海和造船技术的限制，不能进行远洋航行，只能沿着海岸线用“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方式进行，由此南流江流域的合浦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如前所述，南流江流域以合浦的珍珠贸易闻名于世，王章的妻子被流放至合浦后靠贩卖珍珠“累至万金”，可见当时合浦珍珠贸易的繁荣。

东汉时期，合浦的珍珠贸易较之前更加繁荣，与交趾商贸往来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合浦太守孟尝。《后汉书》载：“郡（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2]通过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合浦与交趾之间不仅珍珠贸易繁荣发展，而且因为海域相邻，商业竞争激烈。当合浦采珠过于频繁之时，珍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合浦政治清明之时，又恢复了原来的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合浦人民经常前往交趾以珠易粮，说明在东汉时期合浦与交趾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1924年越南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墓葬中出土了大批汉代的铜钱，1960至1962年越南考古工作者在越南清化省邵化县邵阳乡阳舍内存发掘了18座汉代墓葬，出土钱币共92枚，都属于五铢钱；越南考古队在1964年对越南海阳省四奇县玉山乡玉乐村的一些古墓进行了发掘，

在 M1 和 M4 发现 30 枚货泉。^[3]越南清化省和海阳省地处越南北部，在汉代属于交趾郡的管辖范围，这些汉代五铢钱和货泉的出土，这是交趾与合浦之间有经济联系的有力证明。

三国时期，合浦地区与交趾保持着珍珠贸易，仍采取两汉时期以米易珠的方法。后来，吴国政府发现珍珠贸易利润巨大，于是由官方垄断了珍珠的采集和贸易。自此之后，合浦的珍珠虽偶有民间贩售，但从三国时期直至明代基本上都处于政府垄断的状态。

二、南流江流域出土的外来元素文物

在南流江流域历年发现和发掘的考古遗存中，除了中原地区器物和本地器物的发现外，还出土了一批具有外来元素的文物。这些具有外来元素的文物年代以汉代为主，包括玻璃、玛瑙、水晶、香料、胡人形象的器物、低温釉陶壶、铜钹等，具体情况如下：

（一）奇石异物

合浦出土的奇石异物包括水晶、绿柱石、琥珀、玛瑙、蚀刻石髓珠和石榴子石，其中水晶、绿柱石、玛瑙等或单独成串出现，或组合成串饰出现。

1. 水晶、玛瑙、琥珀

合浦望牛岭西汉木椁墓中的水晶串珠由 27 件水晶珠组成，包括“白水晶六棱珠形 6 件，六棱柱形 7 件，圆球形 1 件；蓝水晶网坠形 3 件，六棱柱形 4 件，不规则 6 件。花玛瑙穿坠由 9 件玛瑙珠组成，包括红色算珠形玛瑙珠 4 件，橄榄形花玛瑙珠 5 件。蓝玻璃串珠 3 串，直径 0.5~0.6 厘米”^[4]。合浦九只岭汉墓也出土有组合串饰，其中 M5 和 M6a 各出土 2 组，M6b 出土 1 组，质地有金、水晶、玛瑙、玻璃珠和琥珀。^[5]水晶无色透明，属大型石英结晶体矿物，因含不同的混入物而呈现不同的色彩，主要产于阿尔卑斯山脉和叙利亚等地。玛瑙属带有纹饰构造的玉髓，因含色素离子及杂质而呈现出不同颜色，各色相间形成多种不同色彩的层纹状、条带状花纹，产地包括印度、越南、埃及等。琥珀是由松柏科、云实科、南洋杉科等植物树脂石化形成的生物化石，一般呈黄、黄褐等色。合浦奇石异物既有各种形状的水晶、玛瑙珠饰，如圆形、管形、柱形、球形、不规则形、橄榄形等，还有仿动物形的玛瑙和琥珀，包括鸟形、鸳鸯形、猪头形、羊形、狮子形等。狮子形饰物产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以及欧洲、非洲等地，汉代水晶、玛瑙、琥珀等均来自缅甸、印度甚至更远的罗马等地，从狮子造型的玛瑙、琥珀来看，合浦地区的玛瑙、琥珀等更有可能来自印度或罗马。

合浦地区汉墓中发现的琥珀除串饰外，还有印章，目前共发现 6 枚琥珀印章。望牛岭西汉木椁墓出土琥珀印章 1 枚，龟钮，略作长方形，长 1.5 厘米、宽 1.2 厘米、

高 1.5 厘米，阴文篆书“庸母(?)书”^[6]。堂排汉墓出土琥珀印章 2 枚，其中一枚正方形，蛇钮，边长 2.3 厘米、高 2.1 厘米，刻“劳新割印”，字迹潦草；另一枚呈半球形，刻“玉以明印”，字迹工整^[7]。九只岭 M5 出土琥珀印章 2 枚，其中一枚圆形穿孔，高 1.2 厘米、宽 0.6 厘米，印文已模糊，仅辨出“黄□□印”^[8]；另一枚为龟钮形方印，宽 1.3 厘米、高 1.4 厘米，印文为篆书“黄昌私印”^[9]。凤门岭 M23 出土半圆形琥珀印章 1 枚，印文为“子君□印”^[10]。其中，有些是专门用琥珀制作的，如龟钮印章和蛇钮印章，也有的是以琥珀串饰品改制而成的印章，如半球形印章。这些印章的发现说明当时的人们以拥有琥珀为身份的象征。

除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有水晶、玛瑙和琥珀外，三国墓葬中也出土有玛瑙和琥珀。如寮尾三国墓 M19 出土“玛瑙耳珰 2 枚，颜色为橘红色，亚腰形，一端大一端小”^[11]；合浦公务员小区一期三国墓 M11a 出土玛瑙耳珰 1 枚，“颜色为橘黄色，亚腰形，一端大一端小，纵穿孔，长 1.8（厘米）、小端径 1.2（厘米）、大端径 1.8 厘米”^[12]；合浦公务员小区一期三国墓 M15 出土琥珀串饰一枚，“颜色为深黑色，扁圆形，中部横穿孔，径 1.5（厘米），厚 0.7 厘米”^[13]。这些玛瑙和琥珀的出土是三国时期合浦的对外贸易的有力证明，也说明三国时期合浦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港口之一。

合浦尚未发现唐代墓葬，历史文献之中却有从合浦出发前往海外的例子。如宋代李昉等的《太平广记》中记载：“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舣舟于合浦岸……夜将午，俄飓风歛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南溟夫人之使者）遂带间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状。”^[14]

《太平广记》记叙的故事多为神怪小说，虽然记载的不一定都可靠，但是也不一定是凭空捏造，可见当时确有合浦前往交趾的航海路线，而且此时琥珀俨然成为护航的神圣物品，这与两汉及三国时期合浦墓葬中发现的琥珀相对应。前文提及唐代有从合浦出发前往印度西行求法的高僧，可见唐代合浦虽不如广州等大型港口发达，但仍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之一。

2. 蚀刻石髓珠、石榴子石

蚀刻石髓珠是蚀刻玛瑙珠和蚀刻红玉髓珠的统称，考古工作者称之为“缠丝玛瑙”。根据基体和蚀刻条纹的颜色，目前合浦地区发现的蚀刻石髓珠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分别是红色基体装饰白色条纹、黑色基体装饰白色条纹、白色基体装饰黑色条纹和红色基体装饰黑色条纹。^[15]这种蚀刻石髓珠在合浦汉墓和三国墓中均有发现，如“堂排汉墓中出土肉红石髓珠 99 枚，有橄榄形、六棱橄榄形、算珠形、圆珠形，包括雕狮 6 枚，雕鹤 5 枚”^[16]；合浦公务员小区一期 M8a “出土蚀刻石髓珠 1 枚，颜色为深棕色基体装饰一周白色条纹，圆榄形，有纵穿孔”^[17]。熊昭明等人认为合浦汉墓中发现的蚀刻石

髓珠与东南亚及南亚考古发现的类似，可能来自印度地区^[18]。另外，从器型上来看，合浦出土的蚀刻石髓珠中带有狮子形象，则此间合浦地区墓葬出土的蚀刻石髓珠来自印度的可能性较大。至于三国墓葬中出现的蚀刻石髓珠，目前尚未对其进行鉴定，也缺少典型器物的发现，其来源暂不明确。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合浦地区与印度等地有往来，当时的蚀刻石髓珠也不排除来自海外的可能性。

石榴子石是一种矿物，因其晶体与石榴籽的形状相似，颜色相近，故称石榴子石。常见的石榴子石为红色，但其颜色的种类多，常见的颜色有“红色、褐色、褐红色、紫红色、深紫红色、紫色、深红色等”^[19]。合浦汉墓中发现的石榴子石为铁铝石榴石，李青会等人将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部分石榴子石的化学成分与印度宝石级别石榴子石（铁铝榴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结果是吻合的^[20]。

世界上铁铝石榴石产地主要包括斯里兰卡、巴西、马达加斯加、印度等国家，汉代合浦的石榴子石很有可能是从斯里兰卡或印度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此外，合浦凸鬼岭齿轮厂 M6 出土有紫色狮形饰品，可以判断这些石榴子石应是从印度、斯里兰卡传入的。

从两汉至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可以发现，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大量海外的奇石异物不断涌入合浦，这些奇石异物成为当时贸易发达的实物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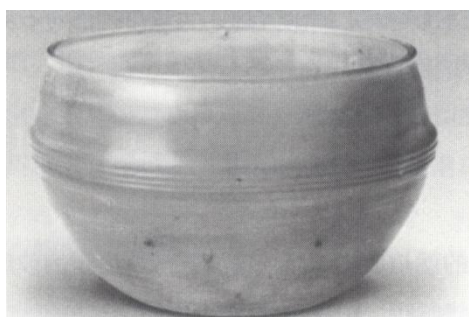
（二）玻璃制品

《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璧琉璃”，指的就是玻璃制品。南流江沿岸出土的玻璃制品主要集中在合浦地区，包括装饰品和使用器皿。熊照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检测表明合浦汉墓中出土的玻璃制品来源有三：一是国外制造的钠钙玻璃，二是北方中原地区的铅钡玻璃，三是南海地区的钾玻璃。其中，环南海北部湾地区制造的钾玻璃占主要部分。“合浦罐头厂 M10 出土的心形玻璃片属铅钡玻璃系统，样品呈无色、半透明状，制作十分精美，在国内同体系玻璃中属罕见。”^[21]（图 4-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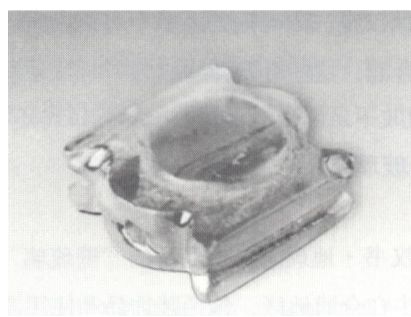


图 4-1 心形玻璃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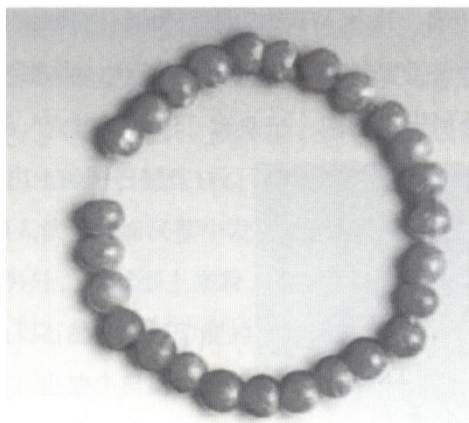
南海地区的钾玻璃系统又可分为印度传入、东南亚传入和本地制造三种类型。“印度传入合浦的钾玻璃主要是中等钙铝的亚类，主要包括六棱柱、扁壶形等特殊几何造型的串饰，以铜着色的红褐色玻璃珠，文昌塔 M70 出土的淡青色玻璃杯等。其中合浦风门岭 M26 和 M23A、母猪岭 M1 出土的红褐色、红色（砖红）玻璃珠为铜红珠或印度红珠；凸鬼岭饲料厂 M202、北插江 M10 出土的 12 面体榄形饰颜色为绿色基调，透明度高，与机械厂 M1、九只岭 M5 和 M6A 出土的扁壶形饰的颜色和透明度相近，初步判断为与印度相似的中等钙铝亚类；合浦罐头厂 M12 出土的粉红色串珠也应来自印度；文昌塔 M70 出土的淡青色西汉晚期玻璃杯与扁壶形玻璃珠的外观特征相似，属钾玻璃，腹中部饰三道弦纹等特点与阿里卡梅度发现的玻璃器残片相似，由此判断这件玻璃杯来自印度。”^[23]（图 4-2^[24]）



1. 淡青色玻璃杯



2. 扁壶形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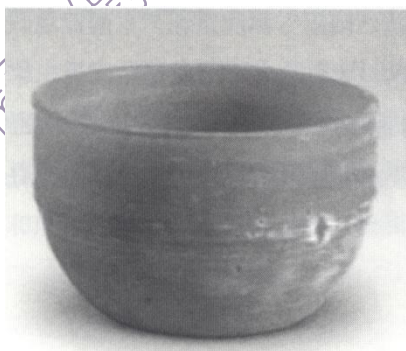
3. 粉红色串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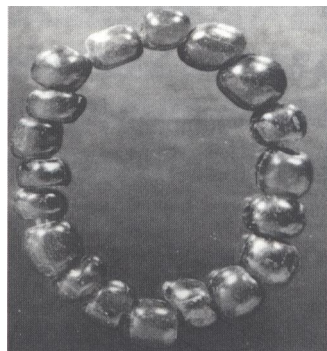
4. 榄形饰

图 4-2 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

中等钙铝钾玻璃在印度、东南亚地区和我国广西均有分布，“合浦黄泥岗 M1 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与文昌塔 M70 出土的青色玻璃杯的化学成分接近，但器形有差异，推测其可能为东南亚传人”^[25]。值得注意的是，合浦九只岭东汉早期墓葬 M5 和寮尾东汉晚期墓葬发现了钠钙玻璃。“九只岭 M5 的钠钙玻璃为湖蓝色串珠，寮尾的主要为蓝紫色串珠。从串珠的成分特点来看，九只岭 M5 和寮尾发现的钠钙玻璃属于罗马玻璃。”^[26]（图 4-3^[27]）



1. 湖蓝色玻璃杯



2. 蓝紫色串珠

图 4-3 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杯、串珠

合浦本地制造的钾玻璃包括风门岭 M26 和九只岭 M5 发现的钾铅玻璃、钠钾铅玻璃，两者化学成分相似，均为豆绿色，含有少量的锡^[28]。（图 4-4^[29]）这些钾玻璃器可能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加入了铅、锡的钾玻璃可能受到了印度玻璃的影响^[30]，可能是当时印度制造玻璃的技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合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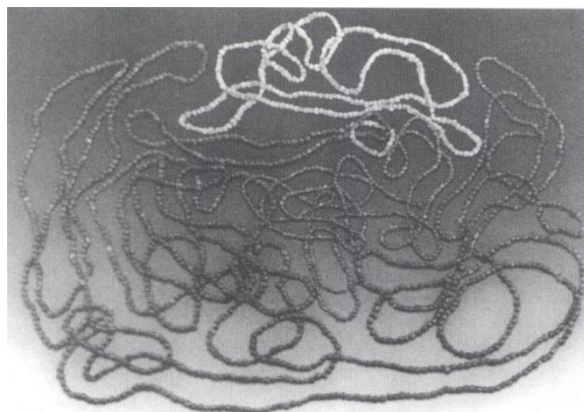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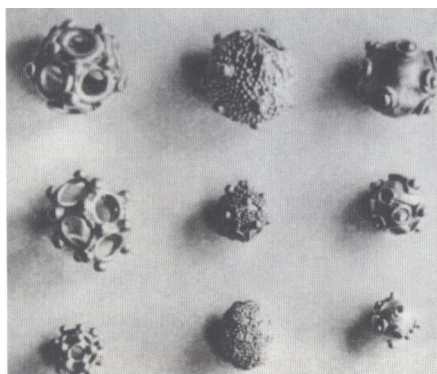
图 4-4 风门岭 M26 出土的玻璃串饰

从合浦汉墓发现的印度、东南亚、罗马等地传入的玻璃及本地生产的玻璃运用的技术可以认识到两汉时期合浦与海外的交通十分发达，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展贸易的城市点之一。同时，广西的平乐、贺州、钟山等地的汉墓也出土了一些具有外来因素的玻璃器，这些玻璃器的传播路线很有可能是由海上丝绸之路转运至合浦，再沿南流江转运至广西内陆地区的。

此外，《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的研究发现，在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发现多个古代的港口遗址，包括南亚地区的帕特南遗址、阿里卡梅度遗址，东南亚地区泰国的三乔山遗址、班达东潘遗址和越南沙莹文化遗址出土的“镂孔金花球、波斯釉陶器、半宝石珠饰、蚀刻珠等类似的器物在东南亚的多个遗址以及合浦、广州等地均有发现，器物的年代范围也基本一致”^[31]，更进一步说明汉代合浦港与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等地航线的存在及海外贸易的繁荣发展。

（三）黄金制品

目前发现合浦地区汉墓出土的黄金制品包括金花球和焊珠金饰片，多用于装饰。金花球，又称为多面金珠，以合浦的北插江盐堆汉墓和风门岭汉墓出土的金珠为代表。北插江盐堆的 M1 和 M4 分别出土了 8 个和 14 个金花球，风门岭 M10 出土了 2 个金花球^[32]。林梅村在《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认为：“湄公河三角洲南端沃奥出土的多面金珠是由于与罗马进行海外贸易传入的。”^[33]从该书中所附的图片来看，湄公河三角南端沃奥出土的金珠的造型与风格与合浦地区出土的金花球基本一致，可见当时金花球的传入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图 4-5^[34]）



1. 沃奥出土的多面金珠



2. 合浦北插江盐堆 M1 出土的金串饰

图 4-5 沃奥、合浦出土的金珠饰品

2008-2009 年发掘的合浦寮尾东汉墓 M14 出土镶嵌在剑把里端的焊珠金饰片，其制作方法是先将金捶打成厚约 1 毫米的薄片，再用细小的掐丝勾出轮廓，用金丝剪成小段后高温吹熔凝集成细密的小颗粒金珠，最后将金珠焊接在薄金片上^[35]。1979 年合浦县环城公社砖厂 M1 及 1953 年广州先烈路龙生岗东汉墓也曾出土过类似的焊珠金饰片^[36]。可见，这种金粒焊缀的工艺品在岭南地区颇为流行。在更早的时候，金珠焊缀的工艺流程行于古代埃及、乌尔（今伊拉克）、迈锡尼等国家，是属于地中海沿岸的金工技法。焊珠金饰片的制作方法很有可能是由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合浦和广州一带的，是当时人员往来和技术交流的见证。

（四）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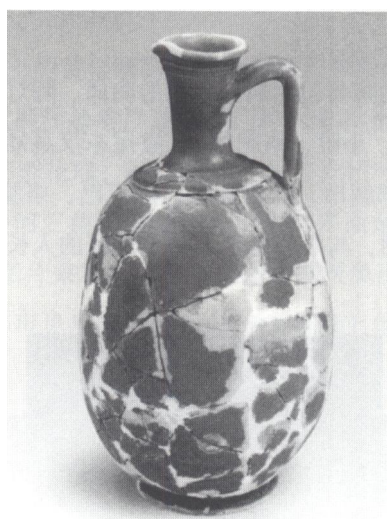
合浦出土的具有外来因素的陶器包括胡人形象的陶俑、陶灯及波斯釉陶壶。如合浦县堂排西汉晚期墓 M1 出土的陶俑竖眉、小眼、络腮胡^[37]；寮尾东汉墓 M13b 出土的俑座灯（图 4-6），俑座为男性，发髻于前额，头部缠巾，深目高鼻，尖下巴，络腮胡须^[38]。这些陶俑的面部特征较为明显，高鼻、深目、络腮胡，与中原地区及岭南地区的人长相差别较大，而与“胡人颇多相似”^[39]。

波斯釉陶壶（图 4-7^[40]）出自合浦寮尾东汉墓 M13b，陶壶表面施青绿釉，黄白色陶胎，火候较低，表面光滑，有细开片，器内施一薄层淡青色釉，可见手工拉坯留下的

粗条指压旋痕。小口外侈，圆唇，“V”形短流，细长颈，椭圆形腹，矮圈足。颈至腹上部附有一曲形手柄，柄上饰二周凸棱，肩部饰二周宽带纹。口径8.2厘米、最大腹径19.2厘米、圈足径10.8厘米、高34.4厘米^[41]。黄珊、熊昭明等人对陶壶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陶片釉面中的微量元素几乎不含铅，镁、钾、钠等碱金属内氧化物重量比超过20%，与塞琉西亚遗址出土的绿釉陶的检测结果相近。从造型、釉色来看，釉陶壶更接近帕提亚地区出土的釉陶壶，而与国内出土的青铜器及釉陶产品迥异^[42]。这件釉陶壶无论从形制还是成分来看，更似中东地区的常用器物，应该不是合浦本地生产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较大。



图 4-6 合浦寮尾东汉墓 M13b 出土的俑座灯图



4-7 波斯釉陶壶

(五) 香料

熏炉是汉墓中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合浦汉墓中出土了不少陶质、铜质熏炉。合浦堂排汉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熏炉“盖有镂孔，有活链与器身相连，出土时内有少量香料和灰烬”^[43]，风门岭东汉晚期墓葬 M24B 出土的陶熏炉“有承盘，炉盖较高，镂孔圆形，顶作鸟形，炉口内敛，腹较深，内有碳化香料残余”^[44]，说明香料广泛使用于当时合浦达官贵人阶层之中。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婆罗洲等地盛产龙脑香。韩槐准的《龙脑香考》认为古籍中描写粤地“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45]，其中“果布”并非指龙眼、荔枝等热带水果及葛布，而是马来语“Kā pur”的对音，即龙脑^[46]。

孙机认为使用熏香的风气是自南向北逐步推广的，高级香料也是经南海输入内陆的。龙脑、苏合等为树脂类香料，须置于其他燃料上熏烧，熏烧树脂类熏炉的炉身要做得深一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树脂类香料放在炭火顶上，使之徐徐生烟^[47]。堂排汉墓熏炉内的灰烬和风门岭汉墓炉身较深的熏炉说明当时合浦地区人民熏烧的香料是树脂类的香料，其可能是来源于东南亚地区的龙脑香（图 4-8^[48]）。



图 4-8 内部存有香料的陶熏炉

三、南流江流域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

在东南亚沿海地区，中国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的陶瓷器均有发现，说明长期以来，东南亚地区与中国有着贸易往来。南流江流域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密切，以汉代和宋代的陶瓷贸易最为活跃。

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后，环北部湾沿岸的合浦、徐闻和日南沿海港口开始了与东南亚沿海港口的远洋贸易。据考证，《汉书·地理志》中的“都元国”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荷兰考古学家海涅·赫尔德恩在中苏门答腊克灵齐 Kerinci 古墓的明器中，发现一件底部刻有“初元四年”字样的灰陶三脚鼎^[49]。1938年，在苏门答腊东岸英德拉吉里 (Indragiri) 的关丹 (Kwantan) 发现了汉代的两耳陶钵，钵上还刻有具汉代武氏祠的人物画像风格的图案。该博物院还在西加里曼丹的三发 (sambas) 发现汉代薄绿釉瓷龙勺，该器物被认为是1世纪的汉代瓷器，用于祭祀^[50]。这样的陶龙勺（陶魁），也见于合浦汉墓中。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立博物馆展出的汉代文物中有与合浦汉墓中常见的陶魁、陶熏炉和五联罐类似的器物，这些器物很有可能通过合浦港口传往印度尼西亚。

在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发现的这些具有汉代特色的文物，证明了《汉书·地理志》所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真实性。这些器物可能是由中原通过水陆运输至合浦，也有可能是合浦本地生产，经海上丝绸之路输出到东南亚各国的。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以陶瓷为大宗商品，朱彧的《萍州可谈》详细描述了当时陶瓷外销的情况：“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51]冯先铭先生认为宋代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西等沿海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与宋代瓷器外销有直接关系^[52]。韩槐准的《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中提到，查雅加达博物院在南洋搜得之宋瓷最多，除大盘、大碗外，其搜得之钧瓷及各种瓶壶之类亦不少^[53]。郑超雄认为韩槐准书中图三列举的很

多器物在广西容县、永福、桂平等地宋代瓷窑中均有出土，“特别是广西出土的某些大碗、水埕以及口沿外翻的碟子均与书中图三所列同类器物极相似”^[54]。韩槐准认为南洋遗留的中国宋元瓷器，有些可以鉴明窑口出处，有些无法鉴明窑口出处，他将这些无法鉴明窑口出处的瓷器推论为华南窑出品^[55]。这些华南窑出品的瓷器应该包括广西瓷窑的产品。

宋代南流江航运发达、水网密布，不排除广西容县等地的陶瓷通过北流江转陆运再进入南流江运往国外销售的可能，同时也说明南流江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道之一。

除陶瓷外销东南亚外，东南亚的冶铁技术也与南流江流域相近。黄全胜等人认为：“桂平罗秀冶铁遗址群遗存的直通式鼓风管与广西平南汉代冶铁遗址、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兴业古绿鸦宋代冶铁遗址出土的鼓风管，从类型、材质和制作技术方面为同一传统。与泰国 Ban Di Lung 冶铁遗址的鼓风管具有相似性，与印度的 Naikund 冶铁遗址、斯里兰卡的 Alakovava 和 Samnalavava 冶铁遗址的鼓风管也具有相似性。”^[56]鼓风管的类似，说明南流江流域与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可能存在密切的交流与影响的关系，同时说明南流江为东南亚地区与广西地区的技术传播提供了便利。

合浦与交趾毗邻，两地之间商贸往来频繁。马援平定交趾叛乱便是取道合浦进入交趾境内的，唐代高骈平定交趾叛乱也是取道合浦。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安南中卫大夫尹子思等入贡，自临安经静江府返回，广西经略司押办官梁衍建议其走廉州水路返回。乘坐郁林返回廉州运盐的牛车和盐船，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安南入贡所过州县，差夫众多。窃见自静江水路可至容州北流县，兼有回脚盐船，若量支水脚合雇，无不乐从；又自北流遵陆一百二十里至郁林州，自有车户运盐牛羊可以装载；自郁林州水路可至廉州，其处亦有回脚盐船。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达交趾。若由此途，则从静江而南二千余里，可以不役一夫而办。”^[57]这段话还原了宋代南流江连接广西北部地区及交趾的交通路线图：从漓江顺流而下可进入西江，再沿西江可进入北流江，在北流江登陆进入北流；从北流走陆路一百二十里经桂门关进入郁林，自郁林可沿南流江顺流直下进入廉州，自廉州可从海路返回交趾；自静江水路和郁林州水路均有回脚盐船，可知当时盐运非常发达，食盐的运输将南流江与广西内陆串联起来，形成了漓江—西江—北流江—桂门关—南流江的内河航运网络。

另外，“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达交趾”，充分说明了当时廉州海运的繁荣。

四、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汉代统治者对于珍奇异物的渴求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

辟使南流江入海口的合浦成为贸易中转站。此后，随着中原地区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及海上贸易的扩张，南流江沿岸经济贸易不断向内陆延伸。南流江的航运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成为中外交流的纽带

汉王朝对合浦地区的开发，几乎是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同时进行的。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南流江出海口——合浦便成了相对畅通的水、陆并举的交通运输路线。随着交通的顺畅，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通过南流江迅速传入合浦，合浦的社会经济在西汉晚期开始崛起。当时，合浦经济的发展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海外诸国的奇珍异宝和中原各地的丝绸集中于合浦，南流江则成为这些货物的输送纽带。这些货物或通过南流江、西江、漓江等水路及与之相连接的陆路如潇贺古道等贩运到中原等地，或通过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运送至海外。在承接商品的南北转运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合浦的社会经济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后，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工艺技术，包括玻璃制造、冶金工艺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最先传入南流江流域，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其发展与中外贸易交流密切相关。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合浦以珍珠继续与东南亚海外地区进行贸易，同时南流江沿岸的浦北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的繁荣，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延伸至南流江沿岸的博白、郁林、兴业等地区。宋代廉州港是海外商品的重要交易场所，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云：“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今廉州不管溪峒，犹带溪峒职事者，盖为安南备尔。”^[58]从周去非的记载来看，廉州与安南原本多有舟楫相通，后由于沉船而更改航线，前往钦州。在安南更改航线之前，廉州应是其主要的贸易场所。

明清时期由于南流江淤积严重，大吨位的船舶无法停靠于廉州湾附近的港口，合浦的海外贸易逐渐衰落。

（二）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物质保证

据相关专家的研究，由于海外诸国对神秘东方的向往，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得以实现。他们对汉王朝献上本国的特产珍物进行朝贡，由此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朝贡贸易关系，形成朝贡贸易圈^[59]。南流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内陆的延伸，这些朝贡商品经由南流江转北流江，经过西江进入漓江，最后经灵渠转湘江后进入中原等地。中国当时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青铜冶炼技术、缫丝技术等也开始通过南流江传入其沿岸地区，再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东南亚诸国，促进了其生产行业的发展。合浦生

产的珍珠及南流江沿岸生产的瓷器通过南流江不断向海外市场输出，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提供了物质保证。宋代南流江流域的种茶业和手工业也有所发展，郁林州的南流与兴业二县年产茶 1240 斤^[60]，廉州生产的吉贝既有洁白细密的慢吉贝，也有粗疏色暗的粗吉贝。这些茶叶和吉贝很有可能通过南流江运输至廉州或钦州与安南贸易，为当地的海外贸易提供丰富的商品。

由此可见，南流江流域江海相连及水陆相连的交通路线是两汉至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内陆的延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而来的商品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技术，在合浦登陆以后，借助南流江—北流江—西江—漓江—灵渠—湘江路线继续北上传播。南流江成为黄金水道，是连结广西与中原及海外诸国的纽带。

两汉至唐宋时期，南流江流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得到了开发，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扩大和延伸，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向南流江内陆地区辐射和传播。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也随着南流江不断传入沿岸地区，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物质保证。明清时期，由于政府的海禁政策及航道淤塞，南流江流域的经济形态由对外转向对内，南流江成为了东盐西运的内河航道。

- [1]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671页。
- [2] [南朝]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473页。
- [3] 廖国一：《汉代环北部湾货币流通圈与海上丝绸之路——以环北部湾地区中国与越南汉代墓葬出土钱币为例》，《广西金融研究》2006年第S1期。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5年第5期。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22-430页。
- [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
-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第42页。
- [1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2012年第4期。
- [1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16，第290页。
- [1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16，第290页。
- [14]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第168页。
- [15] (英)克里斯·佩伦特：《岩石与矿物》，谷祖刚、李桂兰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第86-89页。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22-430页。
- [17]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2016，第289页。
- [18] I. C. Glover, B. Bellina, "Alkaline etched beads in Southeast Asia", In: I. C. Glover, H. H. Brock, J. Henderson, eds. *Ornaments from the past: bead studies after Beck* (London and Bangkok: Bead Study Trust, 2003), P. 92-107.
- [19]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大辞典（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5页。
- [20]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67-169页。
- [21]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83页。
- [22]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图版一二。
- [23]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24-125页。
- [24]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图版二、图版四、图版一〇。
- [25]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36页。
- [26]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37-138页。
- [27] “1”出自：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图版九；“2”出自：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海市文物局：《汉郡遗韵——北海文物精粹》，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38页。
- [28]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60页。
-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彩版四一。

- [30]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59-161页。
- [31] 李青会、左骏、刘琦等：《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汉代合浦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8页。
- [3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第136页。
- [33]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51页。
- [34] “1”出自：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52页；“2”出自：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海市文物局：《汉郡遗韵——北海文物精粹》，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33页。
- [35]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2012年第4期。
- [36]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第175页。
- [3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22-430页。
- [38]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2012年第4期。
- [3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22-430页。
- [40]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2012年第4期。
- [4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2012年第4期。
- [42] 黄珊、熊昭明、赵春燕：《广西合浦县寮尾东汉墓出土青绿釉陶壶研究》，《考古》2013年第8期。
- [4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422-430页。
- [4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第91页。
- [45]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1669页。
- [46] 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2卷第1辑，1941，转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第361页。
- [47]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第359-360页。
- [48] 北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海市文物局：《汉郡遗韵——北海文物精粹》，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23页。
- [49] 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
- [50]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第4页。
- [51] [宋]朱或：《萍州可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9页。
- [52] 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 [53]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第12页。
- [54] 郑超雄：《广西宋代瓷窑初探》，《学术论坛》1981年第5期。
- [55]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代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第15页。
- [56] 黄全胜、李延详：《广西桂平罗秀古代冶铁遗址群初步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年第4期。
- [57]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第7738页。
- [58]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第53页。
- [59] 廖国一、白爱萍：《多元文化的交融：泛北部湾历史文化圈》，《学术论坛》2012年第1期。
- [60]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第5310页。